

弔詭人生——潘國靈

採訪、撰文：鄧淑妍



我好似一個工作狂又好似一個大懶人
我好似一個理想主義者又好似一個虛無主義者
我相信但同時否定
我純然但同時混雜
我實踐自我但同時感到徒然

——潘國靈《迷路》節選

潘國靈這段收在《靈魂獨舞》一書的文字，道出了他本人的性格。身處複雜的社會，人生本來就充滿矛盾。與其說是矛盾，潘國靈認為這叫 Paradox（弔詭，或悖論）。這幾個一般時候皆不被定性為正面的詞語，卻異常吸引潘國靈，而且是他的人生價值觀、作品特色之一。

人生本來就是弔詭的

「不平衡」、「兩極」、「弔詭」、「悖論」，皆可與潘國靈的性格掛鉤。寫作十七年（以小說來說），這種性格無疑在他的創作上有很大影響，並成為某些作品的特色。他認為，世界有複雜性、黑白不是分明的。我們都習慣把東西分得太清楚，然而，現實本來就是個很弔詭、悖論的世界。他舉例，「村上春樹說過：『當你感到很孤獨，但鑽到底，會發覺人人都有孤獨感。』結果他筆下的孤獨，明明是他一個人的，卻人人都共鳴得到。還有魯迅的『為了忘卻的紀念』、昆德拉的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』等，皆是悖論的想法。這些想法，用邏輯思維是分析不了的，但人生中很多事，就正是那麼 paradox。」對他而言，這些想法成為了他作品中某些思想的體系之一，是對生命的、深入他血液的想法。

生活和藝術並不一致

問到他認為對於自己這種性格有何看法，他認為弔詭、悖論令他看事物有兩面性，不會單一化。「世界的曖昧性很大，我們總把事情看得太確定。我們都習慣把話說得很 sure（確實）、很 certain（有把握），但其實它們並非那麼確定的。確定是為了讓大家比較容易生活。而文學，就可以帶我們回到一個比較模稜兩可的世界。」潘國靈認為，生活和藝術是不一致、有張力，有時甚至是對立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們都偏向當一個比較確定、正面的人，但在文學世界，則能展露人的陰暗面——可以大量地寫疾病、黑暗、軟弱，但並不只是負面情緒的宣洩。正如他 2001 年的作品《病忘書》，題材皆是圍繞社會病態、邊緣人物、精神病患者、妓女等等，透過城市地理鋪展，帶有一種社會批判和人文關切。

「在文學的世界中，你是一個人的，你只需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任。而在現實生活中，你要和其他人相處。在倫理世界，有時不

容許你用藝術、美學的方法去回應這個世界的。你會自動自覺地去與人為善。但這不是放棄自己，因為你可以調節。我在寫作的時候，藝術世界的我便會出來。」

兩極之間的選擇

既然需要調節，那必定曾在這種兩極的性格之間掙扎過。他作出了怎麼的選擇？「以旅行為例，旅行是有象徵性的。一個人獨自旅行，或是兩個人結伴旅行，不單是一個事件，而是種寓言。人生如果是一個旅程，你會想一個人上路，還是二人同行？一般人都會希望二人結伴同行，如進入婚姻吧。然而我想到了的是，一個人的狀態、必要的孤獨。那是到目前為止最適合自己的寫作狀態。我想，也許寫作的人根本不適合擁有一個終身伴侶吧。想到這一點，我要考慮的，就是要選擇生活中與另一個人結合，還是自己一個人寫作的我？」大部份人皆會選前者，但潘國靈則認為，生活中的優點——大多數人渴望擁有的 comfortable（舒適）、secure（穩當）、safe（安全）的生活，也許會變成寫作中的缺點。「生活有個很大的 safety net（安全網），你便會離不開生活的軌跡，每天上班、下班，離不開你所接觸的那個世界，很小的世界。這樣，生活可以很容易，但藝術去到某一天便會被膠着。」

用生命寫作

過去曾經有很多衝擊、要作出抉擇的時刻出現，潘國靈告訴我，他總是不會選擇穩定的一方：放棄讀博士學位而選擇寫作、在婚姻門檻前，還是覺得一個人獨身的狀態比較合適。總而言之，他總是會選能夠成就寫作的一方。「藝術和生活的世界，有時可以並容，但到了面對抉擇時，我就會選冒險、不穩定的那一個。」他堅信，

對於一個真正作家，文字應當放最高位，文字會大過身邊所有人，那是接近「用生命寫作」的程度。問到他有否對過往任何一個選擇感到後悔，他淡然說：「既然我每一次都是這麼選，就會知道其實有更內在的因素在影響我的選擇——文字已經 outweigh（超越）其他一切。」他曾經可以過安定、舒適的生活，但他會在安定面前卻步，因為他不單單是一個要生活的人，而是同時有一個藝術、寫作的自己。

年輕亦曾弔詭過

潘國靈的弔詭性格在他還是個學生時已經可見。他在中學時讀理科，但現在卻成了個作家。他認為這不單令他找回自己，而且是逆行行走，對抗主流價值的表現。「香港的學生太聽話了，總是用文、理去思考，覺得只有讀文科才能寫作。這個分野是主流 impose（強加）的，太 artificial（不自然）。你寫小說，別人就以為你是讀中文系出身。這其實是個很狹窄的想法。在愛荷華大學交流的一年間，沒有人會問我是讀甚麼的。外國作家在他們的簡介中，也不會提自己讀甚麼，而是哪幾本書的作者。對他們而言，他們是作家，書就是他們最好的履歷。他們的出身五花八門，例如卡夫卡是讀法律的、薩拉馬戈出身自工人階級、余華本來是個牙醫。」

潘國靈認為，年輕是最可以閱讀的時期，過了某個年紀就無法再密集地閱讀、追回那段時間。「大學時期是最可以大量閱讀、跑電影節、去旅行的時期。貴的去不起，可以做背包族，因為體力許可。」

多重身份 擺蕩間找到力量

現時的潘國靈，是小說作家、文化評論人，也是大學講師。最

初他只寫小說——1998年的《傷城記》、2001年的《病忘書》，後來也寫城市——2005年的《城市學》、2009年的《第三個紐約》等。文學、城市、電影都寫，對他而言，有跨界的感覺，是趁年輕時體力、精神都較好，可盡情摸索自己可能性的一個時期。近年，他把範圍收窄，一半定於文學創作，一半在城市文化，前者自我修行，後者多半為報紙專欄而寫。對於自己的多重身份，潘國靈認為讓他找到一種力量，幫助創作。「單靠文學創作，在香港很難維生，於是要找不同方法支撐、平衡。有人會選擇上午打一份與文字無關的工，然後晚上寫作，例如卡夫卡。而我自己則比較想整體都是文化工作。雖然教學、報紙專欄、文字創作是三個不同的狀態，但離不開閱讀、文學、文化。這樣的好處是整個人都浸淫在這個文字、閱讀的氛圍之中，而且它們可以互相營養。」

他愛文學小說，但亦認為文學創作有潛在危險。「文學創作是個很個人的狀態，要一個人、在很寧靜的書桌上寫，所以有時候會很封閉。」寫專欄可以把他從過於封閉的空間拉出來。同樣是寫作，同樣是一個人完成的，但他認為，寫專欄不同在於思考的切入點比較公共性。於是，既寫小說又寫專欄，容許他有時候比較公共性，有時候則潛到很內在，面對一些自己的幽暗面、內心的孤獨、虛無感。他，享受在兩極之間互相擺蕩下的力量。